

# 重訪五一三時的斑荳谷：中英文系師生 回憶錄中的校園氛圍與學術體制驟變

張惠思

馬來亞大學

## 前言

一九六九年的五一三事件，是馬來西亞當代史中最具有影響力的暴亂事故。其影響之龐大，不僅是其所遺留下來的負面心理影響與內在承擔仍舊宛如一條纏繞無解的複雜心結，可以輕易成為政客五年一次簡易操弄的有效符碼，更多的是其所導向的各種結構構成，至今依舊是牢不可破的頑固框架，影響了每一個後來者。事件的發生起源於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一日，馬來西亞反對黨在選舉中獲得 50.9% 得票率，國會席次也大量增加而上街遊行歡慶勝利。隨後於五月十三日晚上六點左右，一羣馬來青年由雪蘭莪鵝嘜縣(Gombak)出發，前往雪州大臣拿督哈倫(Datuk Harun)的吉隆坡住所集合參與遊行，在文良港地區與華印族人發生衝突。當晚，吉隆坡多地區如甘榜峇魯、怡保路、東姑阿都拉曼路、金馬律、秋傑路等紛紛發生騷亂事件。<sup>1</sup> 晚上八點，內政部長敦拉薩(Tun Razak)宣佈吉隆坡與雪蘭莪實行二十四小時戒嚴，繼而霹靂與檳城二州亦實行戒嚴(〈繼吉隆坡宣布〉1)，

---

\*本文為馬來亞大學研究計畫 University of Malaya Research Grant(RP031C-16HNE)部分成果。初稿發表於中山大學人文研究中心主辦的「後五一三馬來西亞文學與文化表述國際會議」，13-14 May 2019，國立中山大學，高雄市。

1. 爾後，報紙報導記載了一些當時的街道景觀：「在拉惹吻路，一些咖啡茶室大門被闖開，留下遭搶劫的痕跡，椅子七零八亂，鏡子被擊碎。店內的人在騷亂期間已倉皇逃走」(〈隆市戒嚴期間〉1)、「十輛市議會的傾倒羅里車和七部陸軍開路機在清除廢墟，和燒毀的汽車、摩多西卡及史古打」(〈合眾社記者〉1)、「附近的葉亞來街，發生一場火災，軍隊阻止任何人走進該地區」(〈華巫人毆鬥〉1)。

September 16, 2019 收到稿件 / December 3, 2019 接受刊登

《中山人文學報》no.49(July 2020): 61-85

國家宣佈進入緊急狀態（〈大馬元首〉 1）。騷亂地區的民眾很多被送到臨時收容所，其中精武體育館約有一千三百名，默迪卡體育館則有二千餘人（〈東姑昨巡視〉 5）。與此同時，股市休市、交通、<sup>2</sup> 學校停頓，報紙被令停刊四天。報刊零星公佈傷亡人數、被逮捕者數量與被損毀的車子與房屋，怵目驚心。<sup>3</sup>

因為五一三暴動，國家宣布進入緊急狀態長達兩年，民主、法律、憲法、國會亦被擱置長達兩年。國家原則的擬定、新經濟政策政策、國家文化政策的推出，以及種族間緊張的對立關係改變了馬來西亞的政治面貌與結構體制，促使很多個人與族羣命運的徹底轉向，也是造成今天馬來西亞學術格局的關鍵性歷史事件。然而，在目前以政治與種族訴求為主導位置的五一三論述框架中，還沒有對當時大學學術氛圍與驟變提供一個較為清晰的圖景。五一三論述中對大學議題的關注往往直接落在大學種族固打制的討論，而學術格局轉向的過程、學術人員的具體更變、師生面對事件的個人經驗與衝擊等似乎不被學界所注意，故而幾乎湮沒在歷史的暗處中。而這種遮蔽，往往使我們在談論今日馬來西亞普遍嚴重滯後、知識匱乏、學術種族化的高等教育等現實經驗時，<sup>4</sup> 缺乏這一段關鍵性的歷史脈絡。因此，重訪五一三的大學現場，有其必要性。「重訪」之目的，在於理解今日的馬來西亞國立大學為何是以學術種族化為中心？它是如何而來的？

與五一三事件關係最為密切的，莫過於位於斑荖谷(Lembah Pantai)的馬來亞大學。其地理位置上靠近事件震央，且是國家頂端的學術機構，學術體制與氛圍的轉變可說是更為明顯。斯時的校園氛圍究竟為何？身處其中的師生如何面對五一三與五一三後馬來亞大學的學術面貌與大學體制的驟變？事件對身在其中的學者與學生們有何衝擊？本文擬從陳平原的「回到歷史現場」（陳平原 63）的研究理路，以何丙郁、王叔珉、林玉玲(Shirley Geok-lin Lim)、林志成(Lim Chee Seng)等馬大文學院中文系、英文系師生的回憶書寫與文學追憶為中心，嘗試釐清與還原五一三前後即一九六二年至一九七二年作為馬來西亞最高學術機構的馬來亞大學文學院學術內在氛圍與更變，以此窺探五一三事件在學術上所造成的衝擊。以一九六二年為上限，因該年一月一日吉隆坡馬大正式脫離新加坡總校自立，而

- 
2. 當時報刊出現多則與交通停頓訊息，如〈由於吉隆坡發生騷亂，由星開出火車，僅僅載九名搭客星柔往隆，快車亦停開〉（〈由於吉隆坡發生騷亂〉 3）、〈吉隆坡實施戒嚴，港隆綫航機停航〉（〈吉隆坡實施戒嚴〉 6）。
  3. 〈吉隆坡及其周圍局勢仍嚴重，戒嚴令解除期間續發生暴動事件。喪生者達七十五人，兩百七十七人受傷，卅間房屋被焚燬，各種車子百輛遭殃〉（〈吉隆坡及其周圍局勢〉1）。數量不僅於此，可參照 Kua Kia Soong (2007)。
  4. 馬大前任校長賽胡先阿拉達斯任內曾致力改革其體制，委任多名非馬來人擔任院長，最終在爭議聲中被迫致辭。

下限設於一九七二年是基於新經濟政策與種族固打制陸續推行，雷厲風行。而中文系與英文系在五一三事件受到的影響最大，可以說是首當其衝，身處其中的教授與學生也因文筆能力之故，以詩與文為我們留下來了他們「見證的敘事」，俾使我們得以借其等個人生命歷程的記憶，來嘗試重訪五一三。

## 壹、五一三學術震央的校園

今天理解五一三暴動前後的大學學術狀況，往往只能依據當時報刊的報導。報章上的新聞報導的確為至今未建史<sup>5</sup>的五一三提供了一種時間線文獻，這是一種官方發言與突發事件的公共記述。然而，若想要「重訪」歷史現場，或可在報刊報導之外，增添能提供更多立體感的氛圍以及當時學人或學生們內心細微的張力的回憶錄敘述。如曾客座南洋的史學家吳相湘在他的回憶錄《三生有幸》序文中，說了一句很重要的話：「人的活動是歷史紀錄的中心」(吳相湘 1)。本文以回憶錄、回憶文章來重溯五一三事件，是受陳平原提出的「回到現場」的研究理路啟發。

陳平原於〈如何進入歷史〉一文中曾提及：「眾多當事人及旁觀者的回憶錄，為我們進入歷史深處——『回到現場』，提供了絕好的線索。可幾十年後的追憶，難保不因時光流逝而『遺忘』，更無法迴避意識型態的『污染』。將其與當年的新聞報導及檔案資料相對照，往往能有意料之外的好收穫」(陳平原 63)，追憶文章的進路，卻或能讓我們靠近當時人對事件直接反應與衝擊。當時馬來亞大學創辦不久，馬來西亞學術第一批教授羣多來自西方與臺灣、香港，當中有幾本學者的回憶錄中有涉及五一三事件，如王叔岷的《慕廬憶往：王叔岷回憶錄》、馬來西亞學者何丙郁《學思歷程的回憶：科學、人文、李約瑟》與林玉玲的《月白的臉：一位亞裔美國人的家園回憶錄》，他們皆曾是文學院中英文二系的教授。這些回憶錄可以作為我們回到歷史現場的有力資料。這些回憶錄，記載了這些學者一輩子的學術堅守與人生境遇，其中包括了他們身處南洋執教的些許珍貴細節，部分還原了歷史記憶、提供現場氛圍、也同時讓我們讀見了在歷史洪流當中個人微小卻鮮活跳動的內心動蕩與思考。茉莉·安德魯斯(Molly Andrews)在《形塑歷史：政治變遷如何被敘述》(2015)一書中說：「『真實性』在生活史研究的脈絡中，當人們向我們講述他們的生活時，他們都是從一個特定的時刻——現在——來談論，

---

5. 五一三爆發後，官方控制新聞報導，至今也未公開相關檔案，事件本身成為種族敏感事件，因此資料缺乏，有關五一三研究至今仍舊不多，許多具體數據與事件的過程仍未獲得厘清。就與本論文相關的記憶研究而言，有許德發的〈歷史幽靈與馬來西亞的記憶政治：試論一九六九年五一三事件的各種闡釋〉(2002)，刊登於《人文雜誌》第十五期以及林媛婷於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東南亞研究所的碩士論文《五一三事件華人之集體記憶探討》(2007)。前者探討的是五一三記憶被操作，後者則處理了一般華人的記憶。

而且先前生活經驗的意義，永遠會因新的環境而改變。因此，我們對於自己和過去經驗的理解，永遠要在時間進程中不斷回顧。」易言之，回憶與追憶對當事者而言，它顯得特別重要在於所追憶的歷史片斷是他/她當下生命中發生實際意義的事實。在這些回憶錄中的五一三，可說都對回憶者有著其真實性的意義的。本文即以報章之公共記述與個人追憶兩者相互補充，一方面使用報章報導瞭解公共事件，一方面以個人追憶理解身在其中的人們之感受與思考，以求還原真相。

馬來亞大學的校園坐落於吉隆坡西南部的斑荖谷，靠近五一三事件發生地點，亦是當時全馬唯一一所大學。是時，檳城大學在馬來亞大學的協助下，甫開始收生，<sup>6</sup> 而農學院則亦未升格為大學，該年農學院一共有五百六十名學生，宣佈將招收兩百名新生成為大學新生，其中卅名為女生（〈馬大副校長昨日保證〉6）。五一三事件發生後，完全以國語（馬來文）為媒介語的國民大學的設立才更為迅速提上日程。最初作為設立於新加坡的馬來亞大學之吉隆坡分校在一九六二年升格為獨立大學，在大學體制、學術操作與學人交往各方面，幾乎還與新加坡馬來亞大學、甚至是剛剛成立的南洋大學，共享相同的步調與日常。

五一三暴動事發當時，大學正處於年中暑假尾端。那年的新生為一九六九／七〇級生，新生申請大約有四千四百〇四份，估計會錄取兩千兩百人（〈馬來人首次〉5）。他們的迎新周原落於五月十二日，而舊生們開學日則原訂於五月十九日（〈大學新註冊日〉5）。由於五一三事件爆發，大學宣佈展延開學日，一直到得到政府通知為止。《南洋商報》五月十八日以「馬大展期開課，學生全部平安」為標題：

根據馬來西亞播音電台報告馬來亞大學開學日期原定下星期一，經告展期，至到另行通知為止。馬大副校長說，由沙巴及砂拉越來的學生，他們都安全，家長們可以放心。馬大校園內居住的學生，數目多達一千餘名，經編成工作及輸血隊伍，協助當局，他們有充分的糧食。他說住在校外的學生，如欲參加服務，應通知馬大當局，電話五三四〇五，俾便派車輛運載。(5)

因此，五一三前後幾天的大學校園並沒有太多學生，僅有千餘名學生在校園。新聞帶著安撫作用，實際上幾日後「在十五碑，孟沙、白沙羅及八打靈再也區宵禁於中午十二時卅分解除，兩小時後再實施」（〈吉隆坡及其周圍局勢〉1）。根據

---

6. 是年，檳城大學一共收到四百二十份來自大馬、新加坡及汶萊的人學申請書，原本擬錄取六十名，唯只有卅二名申請者擁有所需的基本入學資格。九名馬大教職員包括三名教授協助教授化學、物理、數學及生物的理論課程，另有九名兼職講師協助主持實驗課程。檳城大學後來改名為檳城理科學院（〈檳城大學錄取〉6）。

五月十八日的新聞，十七日那天一直下著毛毛雨，吉隆坡各地及八打靈再也發生一些衝突事件：在八打靈再也的牙辛路(Gasing Raod)，一隊警察巡邏隊於午夜過後不久遭伏擊，警察開火，襲擊者逃走。牙辛路距離馬大相當近，馬大面向八打靈衛星市的校門外是大學路(University Road)，大學路往左延伸，經過馬來亞大學醫院再直行，即是牙辛路。有消息聲稱，在八打靈再也及吉隆坡各地可聞數響槍聲，有一名觸犯戒嚴令人士在半山芭被襲斃。此外，謠言四起，傳說有人準備攻擊馬來亞大學醫院（〈吉隆坡及其周圍局勢〉 1）。

自騷動發生以來，吉隆坡與八打靈再也所有電話線由於使用電話過多的緣故而頻頻失常，一直到五月二十日才恢復（〈吉隆坡八打靈〉 5）。可以想到留校師生的惶恐與不安。當時詩人林玉玲還是馬大英文系研究生，她在回憶錄《月白的臉：一位亞裔美國人的家園回憶錄》中，細述五月十三日當天的個人經歷：

五月十三日星期五，我們讀到劇中女巫出現的一景，這樣的情節在鬼影幢幢的馬來西亞社會，讀來有如兒童漫畫裏的惡魔。水蜥蜴的尾巴、癩蛤蟆的眼睛，一跟馬來西亞人想像中的吸血惡魔、開腸剖肚的惡鬼比起來，全都成了微不足道的小把戲。我想道，若在馬來西亞想靠英國文學開拓未來，實在前途茫茫；一邊又想，就要離開伊克保了，委實心煩意亂。我把車停在加油站的一角，正在加油時，服務員過來跟我說：「你最好趕快回家。」  
.....

街上所有的燈都熄了，我快速騎上坡，納悶八打靈再也到底發生了甚麼事，為甚麼漆黑一片、氣氛詭譎。我一進門伊克保就抱住我，「我為你擔心死了。你沒聽說現在戒嚴了嗎？」(222)

林玉玲的精準且強悍的文學表述能力犀利地把五一三暴動那種低壓的氛圍表達得淋漓盡致：英文系研究生的日常生活、馬來西亞與英國惡魔想象的差距、觸目即無望的愛情與前途等各種煩惱。通過那些不斷反復出現的「鬼影幢幢」、「惡魔」、「吸血惡魔」、「水蜥蜴」、「癩蛤蟆」、「開腸剖肚」等同質詞彙，互奏成一種低沉又縈繞的空氣味道。她去加油站添油，油站服務員趕過來催促她回家，沒說清楚到底發生甚麼事。她快速的駕摩多回到住處，詩人的敏感性讓她察覺到街道上所有的燈都熄滅了，漆黑一片，而且氣氛與平日不一樣，有著別樣的詭譎。一進門，男朋友用擁抱的方式來表達自己的擔憂，告知已經戒嚴。小說化的回憶重演了當時暴動發生時城山雨滿樓風的危機感，提供我們回到了「模擬現場」（陳平原 65）那種氛圍之中。

林玉玲繼而追溯、還原她自己當時對於暴動事件的認知：

家裏只有收音機，沒有電視，所以戒嚴這五天我們完全和消息隔絕。從收音機裏，聽說有一羣來自鄉下的馬來民眾，因為抗議華人舉辦選舉後勝利遊行，跑來示威抗議。報導指稱他們原本身上佩著巴冷刀自衛，結果演變成暴力事件。過了一些時候，先是謠傳，後來看到外電報導，證實在吉隆坡有許多華人的商店遭人縱火燒毀，數百名華人被殺。事後統計，大屠殺的結果有大約兩千人喪生。軍隊進來了，可能是馬來軍人處理種族暴動的速度緩慢，據說還反而射殺了一些華人。(222)

由於是大學研究生的住所，只有收音機，消息不靈通。收音機傳來的消息也充滿各種不確定性與誤導性：引發暴動的馬來民眾來自鄉下？身上佩著巴冷刀原本只是為了自衛？這段回憶錄文字另一值得關注之處是，林玉玲從一開始的「謠傳」、再到「外電報導」、再到「事後統計」，側面指出暴動中死亡人數不是官方在報章中宣稱的百多名，而是大約兩千人喪生，以及一些死亡人數是喪生在馬來軍人槍下。時至今日，官方聲明與民間說法的死亡人數出入過大，那些被減法勾銷的亡者是否存在，還是依舊魅影隨行在我們的家國論述當中。

當時也在校園裏的，還有中文系客座教授王叔岷。王叔岷，號慕廬，四川成都人，一九四一年考入北大文科研究所，師從傅斯年與湯用彤。他年輕時，很有傳統文人風流倜儻的才子氣，時時吟詩作賦，哼曲撫琴。任繼愈說，「傅斯年對我說過，王叔岷有才性，是《世說新語》用的詞彙，指有史才，有史識，悟性好」，因此傅斯年要他把才子氣洗乾淨、下苦工，三年內不許發表文章（王叔岷 48），王叔岷也謹記湯用彤說的「研究學問必須痛下功夫」（李映發 53）。王叔岷在嚴師教導下，奠定他今後一生的學術路子與治學作用，甚至對他立人處事人生修養產生深刻影響。一九四八年王叔岷隨史語所、故宮博物院與中央圖書館遷臺，在臺大教授校讎學、國文、莊子等課。王叔岷自認自己「性情與莊子近」，一生景仰莊子。王叔岷一生的學問，以校勘、輯讎學與莊學為主。工作和生活中，王叔岷性格溫和，平素是與世無爭的。他偏愛自然之道，恬靜自得，與世無爭，不慕名利，一生不參加社會團體，專心學術研究與教書育人。他繼承清代以來的樸學，一生以研究學問為最大的興趣，除了教課，就閉門讀書，節制與理性、溫和且發奮。

這樣一位「淡泊名利之外，謹守規矩之中」（王叔岷 282）的學者，在新加坡、吉隆坡十八年，不是上課就著述，假期也不去旅遊（李映發 54）。因此雖然五月尚屬大學假期，然而王叔岷亦如平日，身處八打靈的住所。根據王叔岷的回憶錄《慕廬憶往》追憶他在馬大客座的往事中，赫然記載了他們一家的五一三經歷：「一九六九年五月十三日（農曆四月初一日）前後幾天，馬來人與華人嚴重

衝突，馬來惡徒，濫殺華人，小孩亦不免於難」(王叔岷 105)。王叔岷這本寫於八十多歲晚年的回憶錄，用筆少簡，不多著墨，這一節題名為〈馬大教書〉的章節中，卻聚焦於這一事件。五一三事發之際，王叔岷與妻子楊尚淑及二兒子國瑜「躲在家裏」(王叔岷 105)。雖然個性溫和，但並非沒有感觸。作為詩人，王叔岷當時寫下五、七言絕句各一首：

〈世亂〉

世亂人皆避，庭空鳥獨閑，  
愁雲屯遠岫，計日祝平安。

〈誰易〉

誰易滔滔天下是，九夷未許即安居，  
狂風怪雨縱橫至，閉戶焉能樂著書！(王叔岷 106)

第一首五絕詩用「世亂」為題，直點五一三事件發生，因為戒嚴，大家都躲避在家的情況，觸目望見清寂庭院中那唯有小鳥獨自逗留的身影，仿佛無事發生一般的閒適，然而實際上內心的憂煩腦愁卻不斷滋長，是以日為計算單位來祝禱平安的到來。第二首七絕以「誰易」為題，是反問又是自問自歎。王叔岷從家鄉四川到南京、從南京到臺灣，早是一輩子經歷過戰爭與離散的一代人；爾後因為要避開中研院中學術的糾葛與不快，又從臺灣「躲避」到南洋新馬十八年，一輩子的顛沛流離，對「世亂」與「狂風怪雨」的理解、感受與感慨不可能不深沉，原是想當一位閉戶著書的書生，躲各種世亂、人間亂象躲到南洋來了，而即便是可以很多不波及的人與事，卻無法抵擋席捲所有人的暴動與戒嚴。隔著舊詩體的套式那種去具體事件、時間與判斷的抽離法，來抒發詩人內心的不安與感歎，仿佛可以把現世現時的具體事務模糊化。

若我們是在王叔岷詩集中讀到這兩首詩，很大可能無法將一位傅斯年弟子、莊學大師、校勘學教授與馬來西亞五一三事件稍稍掛鉤起來。然而在回憶錄中，王叔岷清楚的把歷史情境與詩句留下來。在〈誰易〉一詩中，他引《論語·子罕》之言來為詩加注：「《論語·子罕》篇：『子欲居九夷。』蓋孔子聖道不行於中國，遂欲東往居於九夷，今日之夷境，亦未可安居也」(王叔岷 105)。由於投身於最需要時間耐力、最為枯燥的訓詁學的學術事業，個人興趣在於文學文藝即詩詞與古琴，王叔岷對於寓居新馬教書、研究的海外生活不曾抱怨，然而沒料到即便已經避到南方以南的「夷」地，還是無法安居。其時，王叔岷的女兒國櫻遠在美國，知曉暴動與戒嚴，「憂心如焚，急來長途電話探詢」。王叔岷告知家中諸人皆平安無事，把寫的詩寄給女兒。王國櫻後來和作一首：「驚聞騷亂起，隔海為親憂，

喜獲家書至，平安亦曷求！」(王叔岷 105)王叔岷在回憶錄中還記述因為五一三的緣故，有感尚在高中讀書的十六歲次子國瑜，「膽大不顧危險，不聽勸戒，戒嚴令暫時解除，即往外面跑」(王叔岷 105)，覺得他「有數學天才，但不好學，志大言大，既無能力，卻一心要為貧苦人民作事」(王叔岷 105)，因此下定決定，將國瑜送往王叔岷在美國明州居住的姐姐那裏，為其申請學校讀書。

事發多日的戒嚴時期，大學寂靜一片。一直到五月廿一日，馬大副校長翁姑阿茲教授呼籲大學員工，包括學術與行政員工在五月廿二日早上九點都回到各自的崗位(〈大學副校長〉 1)。五月二十四日，馬大展開新生登記與入學手續的辦理工作。翁姑阿茲教授說：「雖然登記工作受延遲，但現在進行得很順利，第一年級學生的講解可於星期一開始」(〈馬大副校長昨日保證〉 6)。他也對未能前來登記入學的外坡學生作出保證，即他們不必慌張，「居住在外坡的馬來亞大學新生如果未能前來登記入學，馬大將會把學額保留給他們。因為辦理入學手續的工作將繼續開放一個相當的時期。未能前來的學生，可以與馬大當局接觸，以說明延遲的原因」(〈馬大副校長昨日保證〉 6)。他指出，只有那些決定不要接受馬大所供給的學額的人，馬大才刪除名字。那一年新生中，一千三百名就讀文科。住宿馬大宿舍的六百七十九名新生中，80%已經登記。約有五百名沒有在宿舍居住的新生亦已登記(〈馬大副校長昨日保證〉 6)。此外，報章中亦可見馬大師生協助救濟民眾之義舉。在五月廿二日，一則題為〈糧食救濟特別隊，昨往騷亂影響區，分發麥片予人民〉的報導：「這個糧食救濟隊是由十五名華巫印、歐美人士所組成的。他們包括呂鴻元、陳偉權，馬大教授和講師凌連漢、吳炳山、拉特奉、卡森、阿末卡第斯及美國大使館官員弗萊希曼等」(5)。五月廿二日，大約百名馬大生自發地召集運動，收集了衣物與食物，給予需要的民眾，並且幾天內捐六百袋血(〈大學生集會〉 6)。在一片呼籲與彌合種族的報刊報導<sup>7</sup>中，翁姑阿茲教授提呈了一份「大學報告書」，報告如何保障戒嚴期間師生們的糧食供應的措施，同時呼籲全體師生須加強重建種族團結(〈翁姑阿茲〉 5)，然而實際上所有的事情都開始急速地起了改變。

## 貳、學術面貌與體制變化

五一三事件的確是大學學術面貌驟變的分水嶺，終結了源自英國殖民地精英教育制度，重新尋找拉近種族教育失衡差距的方案，卻走上了以失衡來平衡失衡的

7. 其中包括〈中南區秋傑律 華巫親善合作〉(〈中南區〉 5)、〈吉隆坡發生騷亂事件中，兩華籍稚齡兄弟走入巫籍人住家〉(〈吉隆坡發生騷亂事件中〉 6)、〈陸佑律五家巫人堅決要長住下去華族友人給予充份保護〉(〈陸佑律〉 6)。



暴力方式。這需回溯馬來西亞當初的城市人口與教育狀況。當時城市的人口比例與分佈中，多以華人為主。一九七〇年吉隆坡約有四十五萬兩千人口，華人佔 55%，馬來人 25%，印度人 19%，其他族羣 1%。而衛星市八打靈再也人口有九萬三千人，華人佔 63%，馬來人 20%，印度人 14%，其他族羣 3% (Comber 99)。這顯示了英殖民時期分而治之管理與生活方式的延續：華人多居住於城市、馬來人在鄉下，印度人在園丘。在教育體制方面，二戰後馬來西亞教育必須面對存在著複雜多元系統：英校、華校、馬來校、淡校。英校多處於城鎮，十一年基礎教育後報考劍橋文憑；華校自力更生，隨著一九二〇年代中國國語運動、新式教育的提倡及強而有力的董事會自行籌款與運作，無論城鄉到處矗立。淡米爾文小學則多落座在園丘裏。馬來教育由政府所維持，遍佈全國，但多是在鄉區提供進修四年的基礎課程。馬來校給予男學生學習的科目為阿拉伯文與拉丁字母的讀寫、數學、歷史地理、繪畫、體育與園藝，給子女學生培育的重點則是家務訓練。馬來師資培訓則是在蘇丹依德里斯師範學院或馬六甲女校進行(Lim Chung Tat 8-11)。

由於馬來人基礎教育體系未至成熟，以致馬來社會對高等教育猶感陌生，甚至有抗拒心理。在一九三八年十月與十一月，當為馬來亞爭取設立第一所高等教育的 William McLean 與 H.J. Channon 到來視察，<sup>8</sup> 留意到馬來人對高等教育的不信任，因而推遲了在馬來亞設立大學的決定。其中，馬來領袖翁惹化便在柔佛州議會中提出反對意見，因為大學並非馬來人的興趣，因為大部分得益者不會是馬來人，而是非馬來人(Stockwell 1155-1156)。十年後，他才改變想法。因此在新加坡的馬來亞大學創辦之初，就隱含著多元族羣教育機會與分配的各種張力。

無論是學術面貌抑或學術體制，吉隆坡馬來亞大學從作為分校到獨立建校始，便與其母體——新加坡大學有著密切淵源。彼此仍共享著類同的體制結構與師資來源，包括了國際化標準以及著名教授羣之加入(Stockwell 1161)，這當中便包含著高等教育所具備的世界性視野、研究取向的注重與對專業的追求。馬來亞大學之淵源可追索到一九〇五年在陳若錦集資興建的新加坡七州府醫學堂(The Straits Settlements and Federated Malay States Government Medical School) (陳鴻能 41)。一九一二年，七州府醫學堂改名為英皇愛德華七世醫學院。一九二八年，萊佛士文理學院成立，並在一九四九年合併為新加坡馬來亞大學。一九五九年，馬來亞大學分為新加坡分部與吉隆坡分部，一九六一年分部取消，改成新加坡大學與馬來亞大學兩所獨立的大學。一九六二年一月一日，吉隆坡的馬來亞大學正式成立。從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九年，擔任實際主持校務的副校長為奧本馨教授、

---

8. 殖民地政府一直沒有意願發展高等教育，較詳細的分析可以參考 Stockwell(2009)的文章。

黃麗松教授、<sup>9</sup> 陳宏基(Chin Fung Kee)教授、Dr. J.H.E. Griffiths 以及一九六八年起擔任此職的翁姑阿茲教授。早期的馬來亞大學精英導向，錄取者多為優秀學生，校園維持英式傳統，崇尚自由寬容。我們可以從早期任職於馬大的何丙郁院士之回憶錄中讀到當時校內的學術面貌、校園氛圍及其學術專業性的關注。

何丙郁是馬大中文系初創期的掌系人，卻原本並非主修中文，因研究課題的緣故而進入中文系。在回憶錄《學思歷程的回憶》中，他追憶自己從物理系轉入中文系的經過。一九五〇年，他任當時新加坡馬來亞大學的物理系助教，同時負責學士班核子物理與實驗室實驗工作，以及醫學院學生物理實驗課程的指導工作。隔年他通過碩士論文後受聘為副教授，進行觀察氣候對熱帶居民舒適感的影響的學術研究，發表了「何氏系數 (Ho coefficient)」。<sup>9</sup> 後他通過當時化學系講師黃麗松，跟隨劍橋李約瑟教授走上中國科技史研究的道路，這樣的研究興趣以及當時校務所需促成了其與中文系的淵源。

一九六二年，吉隆坡馬來亞大學創辦中文系，聘請劍橋中國考古學家鄭德坤為客座教授，規劃系的組織與課程藍圖，接著通過文學院院長王賡武聘請德國明史專家傅吾康為客座教授兼代理系主任。傅吾康來馬大執教是應王賡武在一九六一年九月參加漢堡青年漢學家會議時之邀。王賡武告知傅吾康，馬來亞大學「打算成立中文系，需要有資格、有經驗的西方漢學家，這樣做是「由於政治原因，大家既不願意從中華人民共和國也不願意從臺灣聘請這些人」(傅吾康 296)。何丙郁指出，「當時的馬來亞大學是一所英國式大學」(何丙郁 74)。這樣的英式體制自然移植了英國大學的學術水平樣式。英國當局由於反共立場，認為須塑造馬來亞華人的「英式思維」，以避免產生未來的難題(Stockwell 1156)。

然而，爾後當何丙郁接任中文系系主任一職時，更為接地氣的何丙郁便清楚指出「在華人社會中的英國教育系統大學，例如馬來西亞、新加坡和香港，中文系常會遇到相當複雜的問題」，是「須顧慮當地華人社會的反應」的(何丙郁 75)。如後來也到馬大中文系執教的錢穆所觀察到的：「實非以前殖民地一般之慣例，僅為傳授華語與教授低淺應用之華文而設，而確有其較高之文化意象之一個正式的中文學學系」，「實係星馬地區之多數華人之一種共同的想望也」(錢穆 167)。同樣是馬來亞華人的何丙郁自然理解華社的需求。在他一九六四年到吉隆坡任中文系講座教授與系主任後，他很快的著手準備解決這個問題。何丙郁所指的是華人社會當時普遍希望有著傳統中文系的出現，而非僅僅是西方大學漢學系樣式。何的做法與英殖民政府所想要達致的漢學系不一樣，但更為適用。

---

9. 黃麗松教授一九六九年轉任新加坡南洋大學校長，一九七二年為香港大學第一位華人校長(Lim Chung Tat 187)。

當時系中更早上任的是程曦與陳啟雲。陳啟雲研究漢代思想，程曦精於中國文學與詩詞。何丙郁認為「在應付歐美漢學界方面中文系已經下了足夠功夫，需要盡力搞好中國傳統中文系」（何丙郁 76），因此他聘請文字學專家陳鐵凡、敦煌學專家蘇瑩輝，中研院研究員兼臺大教授的莊子研究和校讎學專家王叔岷和國史大師錢穆來系（何丙郁 78）。此外，還有胡雋吟與俞王綸協助教學。何丙郁在回憶錄中引陳啟雲後來在美國加州大學聖巴巴納分校所寫的回憶文：

在馬大，傅教授以德國漢學界老前輩的身份講授漢學導論駕輕就熟；程曦先生詩詞歌賦戲曲樣樣精通，由他主持中國文學，真是左右逢源。我則一九六〇年開新亞書院教席以後，這次重返東方教中國古代史以及專門史籍，特別來勁。傅太太，曾華勝太太和俞王綸女士教授中國語言更是經驗豐富。王遵侗女士處理圖書館中文系筆路藍縷以啟先河，替馬大圖書館打好日後的根基，更加上鄭德坤先生的考古美術，王賡武的五代史和南洋史，何丙郁先生由物理學而鉅研的科學史；後來再請的校勘名家王叔岷先生，和國史大師錢穆先生到來擔任客座教授，真是極一時之盛，比美海內外一流大學的中文系亦無遜色。（何丙郁 79）

因此，何丙郁說他在吉隆坡馬來亞大學服務的九年中，以最初的五年最為值得懷念，可惜「曇花一現，陳啟雲離開馬來亞大學兩三年後，情況就改變了」（何丙郁 80）。陳啟雲在一九六六年一月離開，何丙郁所說的是在陳啟雲離開兩三年後，正是一九六八、六九年，所謂的「情況改變」說的正是五一三前後風起雲湧、各種驟變發生的兩年。今天回溯那幾年，一眾老師紛紛離開，胡雋吟、杜為廉是在一九六五年離開，傅吾康、<sup>10</sup> 程曦、陳啟雲與錢穆在一九六六年離開。鄭德坤一九六七年離開，王賡武一九六八年離開赴澳（楊清龍 40-41）。何丙郁自己也在一九七三年離開。這曇花一現的五、六年間，系中擁有這些流動的且擁有世界視野與格局的學者，他們近則與新加坡大學、南洋大學等頻繁互動、遠則往英美德日等世界跑。此外，鄭德坤、何丙郁等學術專精教授羣於最初中文系設系之用心受到大學的尊重與配合、各種學術專業與學問底蘊的課程設置順利通過、各方著名教授聘請與撥款事務上得到解決，以及在斑荳谷校園仍然充滿著可以從事學術的清幽空間，的確塑造了後來再難得一見的盛況。這些都因五一三事件而驟然改變。

---

10. 雖然他是唯一及後還多次回來擔任客座教授的漢學家，但五一三事件期間，他沒有在吉隆坡。

何丙郁在《學思歷程的回憶》中〈族羣的鬥爭與社會的蕩亂〉講述五一三對學術的影響，第一句話便說：「政治環境對學術風氣有很大的影響」(何丙郁 98)。緊急法令實行期間，由副首相敦拉薩主導的行動理事會成立了一個由六十五位成員組成的國家協商理事會，暫代上下兩議會的某些任務，以國會上議院會議室為開會場所。六十五位成員中，有十三人是代表專業團體的，其中兩人代表全國的高等教育學府。翁姑阿茲是其中一位，另外一位便是何丙郁。何丙郁回憶說：「我在協商理事會上數次發言，都是以各民族唇齒相依作為前提，每逢討論如何促成某一比較經濟落後族羣的發展時，同時建議如何兼顧其他族羣的利益」(何丙郁 98)。理事會也委任何丙郁為族羣親善小組的成員，旨在使各族羣瞭解與尊重彼此的文化。然而，整個大環境與之前完全不一樣，校園內外種族情緒洶湧。

何丙郁在回憶錄中提及，自五一三族羣動亂後，「馬來亞大學一部分教職員對國家的政事和大學的校務發生濃厚的興趣。有些講師以族羣為出發點，參與校政和爭鬥政權，例如院長的職位成為一個爭鬥對象」(何丙郁 100)。在這樣動蕩不安的氛圍下，縱然何丙郁還是盡力鼓勵同事們多做些學術研究，親自參與他們的某些研究項目，然而校園內不斷發酵的政治氛圍無論如何還是讓人感到不安，學術與教育所需要的平靜校園與對各學術專業的信任在吉隆坡馬來亞大學成立不到九年，即不復存在。

何丙郁在〈去留的猶豫〉一節中寫道：「朋友們都認為我身處不利的環境，所以伸出援手」(何丙郁 100)。一九六九年，地理系韓沙教授受委為檳城大學首任校長，遊說何丙郁任檳城大學物理講座教授兼系主任；新加坡大學也在探聽他的口風，看看他是否願意回去擔任全職理學院院長職位；南洋大學校長黃麗松亦邀請他擔任歷史系講座教授兼系主任。何丙郁回憶說，「其實我在馬來亞大學的地位是相當穩固的，我已經是該大學最資深的一個教授，而且已獲得政府和校方的信任」，但「其實當時我不忍離開馬來亞大學中文系，認為有留在該學系扮演一個『保衛版圖』角色的必要」(何丙郁 100)，因為「中文系所面臨的不僅是『版圖之爭』，而且是『存亡之爭』。文學院中有些人企圖把中文系的歷史割讓給歷史系，中文歸屬語言中心等等。我必須留下，盡力保衛這個中文系，以防它遭受解體的命運」(何丙郁 100)。何丙郁沒有記述細節，然已清楚的指出中文系在當時的大學校園中可能被解體的危機處境。在何丙郁努力下，中文系幸得保存，但影響全校政策的大局問題，他無能為力。

大學學術體制於當時最明顯的改變便是大學的國內和校內公文、會議和授課語言都改用馬來文。《國語法案》雖是在五一三事件前兩年於國會通過，然而馬來語成為「真正的國語」，停止英語在大部分官方用途的應用、對其他語言的冷

待與打壓，卻是在五一三後驟然施行，<sup>11</sup> 並延續多年不曾停止。中英文二系首當其衝，尤其是當時仇視英文的氛圍在大學中激進學生羣中起同步作用。英文系教授林志成在《斑荳谷中的大學一瞥》(*The University at Pantai Valley Glimpses of the Past*)一書中撰寫的回憶文章〈馬來亞大學的英文〉(“English in the University”)回憶起：「我非常清楚的記得(五一三)騷亂之後，追求國家語言的激進行動」(106)。一九七〇年，當時林志成尚是英文系的大一生，親眼目睹由於五一三暴亂之後，在大學校園中對於去英文化的激烈舉動——他的同學把校園內的英文招牌抹黑塗掉。他亦提及，爾後好多年，英文系都必須每年遞上申請信給國家最高元首，以便可以得到採用英文教學的特別允許(106)。由於大學行政原就是由上而下的指令，沒有商量的空間，無論是中文系或英文系，都只能接受，這便是何丙郁所說的無能為力。這裏的回憶錄不僅記述著校園一瞥，實則也具體的映照出了當時行政體制與氛圍的更變。

真正的教務操作上，在充滿愛國姿態的國家語言的實施當中，馬大文學院很快地在一九六九年至一九七〇年的教務更變中便出現了語言替換的行動，即開始在文學院中推行國家語言課程(Lim Chung Tat 189)。國語化的大學體制，這樣政治正確的去殖民地語言、最好的愛國行動，卻為學術發展帶來停滯落後的漫漫長路。從學術語言而言，由於教學與使用語言的過於急速的轉換，馬來語作為一個新興的學術語言來說，實際上嚴重缺乏學術積累，幾乎無法精確的進行研究描述。研究，往往淪為某種粗糙形態的翻譯品。從國際學者的視角而言，這樣的語言障礙便也預示著離去的警示。可以說，這樣學術體制的改變以教學語言的撤換為始，實際上卻是以學術人員種族化為終結。

### 參、學術人員的離開與大學擴招

這樣的校園氛圍必然不利於學術發展。一九六二、六三年聘請而來的第一批學者與教授在六十年代末紛紛離開斑荳谷。是時，大學處於不穩定的狀況當中，有兩個議題進入了公眾視野。一是馬大學術人員大量辭職事件；二是大學擴招問題。早在一九六六年底，馬大學術人員工會就披露了馬大學術人員大量辭職事件及人才外流的嚴重情況。隨著歷史系主任王賡武教授、馬來文系主任賽胡申阿拉達斯教授、數學教授依利澤教授辭職，應用經濟系主任林崇椰博士、前教育學院院長

---

11. 《國語法案》的施行，確立了馬來語是唯一的官方語言，雖然官方場合允許使用英文。五一三暴動後相隔不到兩個月，一九六九年七月底教育部就推出了分階段推動馬來西亞語(Bahasa Malaysia)計畫。一九七〇年代，政府逐步消滅了英校系統，馬來語成為主要的教學語言，此為中學教育。

王惠卿教授、理學院院長黃麗松教授等人先後宣布將離開馬大，公眾人士對於辭職事件更加關注。一九六九年二月，《南洋商報》刊登謝世順的專稿〈談馬大學術人員的辭職事件〉，述及馬來亞大學理事會為了調查馬大學術人員大量辭職的情況，委任馬大署理校長丹斯裏蘇菲安法官為調查馬大學術人員辭職原因的委員會主席。經過一年零一個半月調查工作後，長達九十五頁的報告書正式公布。謝世順專稿中指出：

對於馬大學術人員的辭職事件作了一番一般上的說明，但未深入的個別的加以分析。對於辭職的原因，他雖有提及，但似乎避重就輕。不過，對於馬大的行政，報告書卻一連提出了四十六項改善的建議。(5)

蘇菲安法官調查委員會指出大量學術人員辭職是由於學術人員人數增加，流動性也隨著提高的緣故。謝世順指出，「從某一個觀點來看，這確是事實。但是，當我們考慮到這些辭職者都是在馬大服務多年，在馬來亞的學術界上深獲名望的學者時，我們就會發現單以人數來衡量辭職事件的嚴重性，是不很正確的」(5)。此外，調查委員會把辭職原因分為「嚴重」、「合理」及「瑣細」三類。所謂嚴重，大約是指馬大當局與工作人員之間在聯系上存在鴻溝，未能建立良好的關係與諒解；所謂合理，是指年輕的教學人員喜歡到各大學吸取經驗，不想固定在一所大學服務，至於所謂瑣細，是指電話、冷氣機的分配的問題（謝世順 5）。蘇菲安調查馬大行政的報告書的公布，看似充滿認真與準備正面面對問題的報告書，卻似乎無法真正解答問題的根源。

五一三事件後，陸續再有學術人員離開斑荅谷的消息。一九六九年七月報章以〈上個月內四人辭去馬大教席〉為題，提及離職的有醫學院解剖學系主任巴里教授、大學醫院鼻喉專家徐春生醫生、經濟學院統計學講師蘇端福博士以及其妻子歷史系講師程淑華博士。曾在哥倫坡、牛津及加拿大執教的巴里教授，將前往加拿大進入一所新醫學院執教。蘇端福博士將在十月加入香港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第一位統計學教授，而徐春生則計劃設立私人醫務所。王叔岷教授在這樣的動蕩氛圍之下，在一九七二年秋接獲南洋大學中文系聘書，即離開馬大。堅持留下保系的何丙郁也終於以私人理由即為了提供孩子更好的教育，在一九七三年離開馬大，前往澳洲的大學執教。林玉玲回憶錄中也提及英文系教授法爾利教授在一九六九年的離去，回返英國(217)。在五一三事件的政治與種族敏感性之下，即便沒有明言，然而大學講師們連接去職的時間點以及整體大學內外政策無疑是其中不能或缺的導因。在何丙郁回憶錄中，對於五一三所造成的工作上的風聲鶴唳與無力感幾乎是去國之前的回憶中佔據著明顯的篇幅。在林玉玲的回憶敘述，她

明確表明是因為五一三事件而選擇離開。

當時尚為研究生的林玉玲在回憶錄中記述了個人的沮喪、遭遇到的校園氛圍以及同學的態度。她提及大學裏有著明顯的緊張氣氛。以前本來就不跟馬來人來往的華裔師生，現在更是擺明跟馬來人保持距離。回憶錄中，林玉玲銘刻下同系的一位蘇格蘭與馬來貴族混血兒碩士生蜜莉恩所說的話：

她曾得意洋洋的說了一句話，許多年來一直像一句箴言般，教我無法釋懷，她說：「我們馬來人寧願讓馬來西亞變回叢林，也不情願給華人統治。」因為種族歧視嚴重，馬來人對華人在馬來西亞的一切經濟成就，此時忽然變得非常冷漠，蜜莉恩的話不過是表達大多數馬來人的想法罷了。要不是華人勤奮努力，馬來西亞怎麼可能有如今的繁榮進步呢？對這個問題，蜜莉恩說：「我們不需要華人。要是沒有華人，我們就得過著落後貧窮的日子，我也甘願。」(223)

在馬來西亞菁英逐漸成形的過程中，五一三暴力事件變成一場血腥革命，馬來西亞的願景原本希望達到多元文化一律平等的理想（儘管一些敵對分子批評這種理想是「權利分贓」），如今卻變成以馬來人為主導、種族階級分明的態勢。蜜莉恩大言不慚地說，雖同為公民，我們的地位不相當，她說我的社羣是一個問題，而種族大屠殺正是處理這個問題適當的方法。(224)

蜜莉恩身上英巫混血的「正統」意味、高人一等的貴族背景、加上年輕的坦率與衝動，在五一三激烈的氛圍中一一化為尖銳與具傷害性的對白。五一三後急速推行的馬來人至上政策、包括馬來人地位之獨尊，皆是這一場激烈對話不能或缺的背景，發酵成一種徹底的抗拒性情緒：「我們不需要你們。」林玉玲回想那時年輕的自己，木然地坐在蜜莉恩面前，心裏只有一個念頭：離開。她沉重的寫到：「心想自己大概再也不會回馬來西亞了」、「夢想破滅之後，出走似乎是比較容易選擇的路。後來有成千上百的馬來西亞人移民到澳洲、香港、新加坡、英國、加拿大以及美國」(224)。回憶錄中的人與事當然是很個別經驗，但從這些個人經驗的敘述中卻不得不觸摸到的充滿鮮明的哀傷與憤怒。可以說，五一三事件的氛圍不僅讓教授羣感到不安，也包括了身在其中的學生。

而沒有離開、剩下的人，都須面對暴動後種族比例、教學語言等體制、行政與校園氛圍的大幅度扭轉。五一三後，巫統通過國家行動理事會，以行政指令的方式推動政策轉變。在高度教育方面，直接用數字來解決族羣比例，大學學生人

數驟然提升。一九六九年四月八日，《每日新聞》就討論〈大學是否應該擴大？〉(2)，提出學生人數擴大與興建新大學的議題。馬大地理系約瑟教授在其回憶文章中，提及大學中比例過低的馬來學生的現象，急需關注。約瑟教授指出，一九六九年馬大共有六十一位符合醫學學士和外科學士學位畢業生，只有七位馬來學生，佔 11.5%。一百一十一位理科榮譽學士，只有一位是馬來學生，一百八十八位理科畢業生中，只有十四位馬來學生。<sup>12</sup> 而當時馬來中學畢業生的失業率攀升超過 25%。

因此五一三後的種族大氛圍底下，政府採取過急的行動以平衡大學中所謂種族比例的失衡。然而，一九七一年由國家行動理事會任命的馬來亞大學校園生活研究委員會之報告(Report of the Committee Appointed by the National Operations Council to Study Campus Life of Students of the University Malaya)指出，學生羣體本身的種族比重，教師的種族比重，乃至當時的學術界都沒有反映出整個國家的構成。爾後，高等教育檢討委員會成立，提出「瑪吉依斯邁報告書」(The Majid Ismail Report 1971)(Abdul Majid Ismail, 1971)，報告書中提出這樣的要求，即在大學招生人數和專業上要顯示出社會人口結構，即無需一考試成績錄取學生，為固

*Table 1*  
Annual Enrolment of Students (With Their Racial Breakdown) Since 1959 in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

Year	Chinese	Malays	Indians	Ceylonese	Eurasians	Others	Grand Total
1959-60	195	62	41	16	4	4	322
1960-61	376	144	88	36	9	9	653
1961-62	585	217	120	62	14	12	1,010
1962-63	786	274	161	82	16	22	1,341
1963-64	1,041	358	211	75	26	24	1,736
1964-65	1,330	543	211	100	18	23	2,225
1965-66	1,669	721	292	103	24	26	2,835
1966-67	2,034	1,038	329	142	32	28	3,603
1967-68	2,559	1,401	377	159	32	32	4,560
1968-69	3,102	1,825	402	175	39	23	5,566
1969-70	3,532	2,373	516	177	35	39	6,672
1970-71	3,785	3,123	565	191	28	85	7,777

圖一：一九五九年以來馬來亞大學吉隆坡做為分部至一九七一年依種族分佈的年度入學表(Khoo 107)

12. 這個數據與 Lim Chung Tat 所記述的有出入。林書中一九六九那年，馬大有六十五位醫學學士和外科學士學位畢業生，一百三十四位理科榮譽學士以及兩百九十八位理科畢業生(Lim Chung Tat 199)。



打制的開端。大學固打制（種族名額分配制）因此而首先在馬大實行(Abu Bakar & Joseph 56)。一九七〇年，學生數量高漲，醫學院畢業人數為六百三十一人，理科畢業生攀升到一千三百六十三人，文科人數更是攀長至三千二百六十五人。一九七一／七二學年，招收了八千八百六十一學生，文學院的馬來學生為兩千四百八十人，非馬來學生則是一千〇九十八人。圖一是馬大從一九五九年在吉隆坡做為分部到自立後一九七一年的人學表。

約瑟教授在其回憶文中有回溯在七十年代韓沙教授曾在大學中召集地理系的學術人員來商討實現馬來化議題，約瑟不同意，「因為當時很少有馬來人合格」(Abu Bakar & Joseph 50)，他覺得這樣遊戲化的人數增長，不過是一種「採取絕望的措施來糾正種族」(Abu Bakar & Joseph 50)不平衡的狀況，是「沒有真正的戰略規畫，只是不惜一切代價增加數量的臨時嘗試」。他語重心長的提出了忠告：「若能鼓勵外籍學者留下，我們可以從最聰明的馬來學生中培育出一羣馬來專家，並將他們送到世界上最好的大學」(Abu Bakar & Joseph 50)。然而，事情的發展並沒能如此。此一忠告也說明此時外籍學者在五一三之後已不願意留下，這一問題遺留至今。

## 結論：遺留者的難題：學術建構

重訪五一三時期的斑荳谷，可見經歷了一場粗暴的政治暴動後，它給甫未建立的大學體制與人文學術帶來一場浩劫，尤其是當時唯一一所大學——只成立數年、正在形構中馬大，以致被迫過早放棄了原可維持更長一段有著國際視野、學術追求與能力的師資、以能滋生真正的學術風景的可能。學術傳統的建構，需要可以景仰的大師級別的教授、需要在學術中高大身影的指引、需要具有競爭能力的同儕，也需要理想學術想象的淵源、也需要自我校格形塑的時間與空間。然而，當學術告別了專業考量，只以種族利益為考量，不管是師生、行政人員皆然，那麼學術活力終究將窒息。

生於福建，讀於英華書院，考入燕京大學、哈佛大學，被委任規劃、建設馬大中文系的考古學家鄭德坤在《斑荳學報》第一期的序文中為斑荳谷留下的那段充滿古意與詩意、華麗辭藻的介紹：

斑荳谷原是馬京郊外的一片荒野，丘陵起伏，豁壑比鄰，滿山遍野是錯叢的林木和雜亂的荊棘。自馬大葡居於此，經幾年的經營開發，這片窮谷已變成全國最高學府。校園建築，井然有序。清真寺高聳予前，未名湖閃爍於中，藏香樓雄立於後，其他學院校舍，環山而起，各據一峯，形勢雄壯。園中草木，布置簡樸，國

花點綴，幽秀鮮麗，修竹茂叢，棕椰成列，路旁綠草如茵，湖上橋影倒置。自八達靈衛星市越嶺而下，俯視校園全景，幽雅別致，頗有桃源風趣。(楊清龍 3)

文字中可以感受其推敲排比、咬文嚼字的鏗鏘有力的文學味道。而這樣的人文情懷、這樣「凝視」斑苔谷的古典感覺終竟不可見。

通過中英二系師生的回憶錄中對於五一三事件所帶來的各種學術體制與氛圍的重現，可以看見的是馬來西亞學術隨著國家的巨大轉變而轉變，英國人留下的精英教育與學術專業傳統被過早的遺棄，國外學者紛紛離開。爾後，留下的是匆忙接手的年輕學生作為講師隊伍的接班人。<sup>13</sup> 國語化的大學體制、研究與教學人員的離開與替換，都一再顯示了五一三粗暴的、歇斯底里的解決問題的模式，無論在體制上、行政上、氛圍上，都不利於學術工作的進行。中英文二系充滿研究與寫作潛能的教授與學生也因五一三事件而選擇離開，從此之後不再回來。何丙郁曾經面對的系所存亡之爭，在往後漫長數十年間不斷重複，耗盡原本就不成熟的學術氛圍與學人精力。跟隨大學各種因時因勢的要求，聞風起舞而非隨文風起舞的研究平扁化傾向，逐漸演變為沒能有學術理想追求的文科研究視野。研究關懷的失衡，亦使得真正的溫柔敦厚之不可見。這些，都是後五一三學術工作者尚且未真正解決的遺留者難題，而這難題似乎至今亦沒有看見解決的可能。

## 徵引文獻

Abdul Majid Ismail (1971)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Appointed by the National Operations Council to Study Campus Life of Students of the University Malaya* (Kuala Lumpur: Jabatan Penchetak Kerajaan).

Abu Bakar A. Hamid & K.T. Joseph (eds.) (2009) *The University at Pantai Valley Glimpses of the Past*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Andrews, Molly [茉莉·安德魯斯] (2015) 《形塑歷史：政治變遷如何被敘述》 (*Shaping History: Narratives of Political Change*) [2007]。陳巨擘(譯)(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

13. 以當時的中文系而言，雖然初創時期有眾多教授，主修學生人數寥寥無幾，單主修的學生從一九六五年至六九年只有十六位，第一位碩士生為一九六七年畢業的吳天才，第一位博士則到了一九七九年才出現。一九六五／六六學年單主修中文系的學生只有一位、廿位為雙主修；一九六六／六七學年單主修的只有四位、廿一位為雙主修；一九六七／六八學年單主修的只有五位、十五位為雙主修；一九六八／六九學年單主修的只有六位、四十二位為雙主修(楊清龍 175)。

- 〈檳城大學錄取卅二名理科生訂期六月二日上課馬大教授協助講授〉(1969)。《南洋商報》，22 May: 6。
- 陳鴻能(2007)《華人與新加坡中西醫學：從開埠一八一九到建國一九六五年》(新加坡：新加坡中華醫學會)。
- 陳平原(2019)〈如何進入歷史〉。陳平原與夏曉虹(編)：《觸摸歷史：五四人物與現代中國》。增訂本(香港：中和出版社)。
- Comber, Leon (1983) *13 May 1969: A Historical Survey of Sino-Malay* (Kuala Lumpur: Heinemann Asia).
- 〈大馬元首緊急宣告進入嚴重緊急狀態政府有權將違犯戒嚴令者將其驅逐出境或判處死刑〉(1969)。《南洋商報》，15 May: 1。
- 〈東姑昨巡視數騷亂地區保證居民福利將受政府照顧兩處收容所難民糧食充份供應雪州另一萬戶獲配以主要食糧〉(1969)。《南洋商報》，19 May: 5。
- Franke, Wolfgang[傅吾康](2013)《為中國著迷：一位漢學家的自傳》(*Im Banne Chinas*)[1997]。歐陽甦(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
- “Harus-kah Universiti di-perbesarkan?” [Should the university expand?] (1969). *Berita Harian*, 8 April: 2.
- 〈合眾社記者目擊隆市暴亂情形，幸獲脫身〉(1969)。《南洋商報》，13 May: 1。
- 何丙郁(2007)《學思歷程的回憶：科學、人文、李約瑟》(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 〈華巫人戰鬥，十五人喪生〉(1969)。《南洋商報》，14 May: 1。
- 〈繼吉隆坡宣佈戒嚴之後雪霹及檳城亦實施戒嚴〉(1969)。《南洋商報》，14 May: 1。
- 〈吉隆坡實施戒嚴，港隆綫航機停航〉(1969)。《南洋商報》，15 May: 6。
- 〈吉隆坡及其周圍局勢仍嚴重戒嚴令解除期間續發生暴動事件喪生者達七十五人，二百七十七人受傷卅間房屋被焚燬，各種車子百輛遭殃〉(1969)。《南洋商報》，16 May: 1。
- 〈吉隆坡八打靈解嚴時間再延長局勢續有改善巴士恢復川行，郵政總局開放森甲兩州一般情況良好〉(1969)。《南洋商報》，21 May: 5。
- 〈吉隆坡發生騷亂事件中，兩華籍稚齡兄弟走入巫籍人住家〉(1969)。《南洋商報》，28 May: 6。
- Khoo Kay Kim (2005) *100 Years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 Kua Kia Soong[柯嘉遜](2007)《一九六九年大馬種族暴亂：五一三解密文件》(*May 13: Declassified Documents on the Malaysian Riots of 1969*)[2007]。楊培根(譯)(吉隆坡：人民之聲)。
- 李映發(2015)〈莊學大師王叔岷〉。《西華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34.5 (Sept.): 53-58。
- 〈糧食救濟特別隊，昨往騷亂影響區，分發麥片予人民〉(1969)。《南洋商報》，

22 May: 5。

Lim Chee Seng (2009) “English in the University.” *The University at Pantai Valley Glimpses of the Past*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05-121.

Lim Chung Tat (2013) *University of Malaya 1949 to 1985, Its Establishment, Growth and Development*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Lim, Shirley Geok-lin[林玉玲](2001)《月白的臉：一位亞裔美國人的家園回憶錄》(Among the White Moon Faces: An Asian-American Memoir of Homelands)[1996]。張瓊惠(譯)(臺北：麥田出版公司)。

〈隆市戒嚴期間，街道一片冷靜〉(1969)。《南洋商報》，19 May: 1。

〈陸佑律五家巫人堅決要長住下去華族友人給予充份保護〉(1969)。《南洋商報》，8 June: 6。

〈馬大副校長昨日保證外地新生未登記彼等學額可保留入學手續將繼續辦理〉(1969)。《南洋商報》，25 May: 6。

〈馬大展期開課，學生全部平安〉(1969)。《南洋商報》，18 May: 5。

“Mahasiswa berkempen membantu orang-orang pelarian” [University student rally to help refugees] (1969). *Berita Harian*, 22 May: 6.

“Pertama kali Melayu jadi dekan fakalti pertanian” [Malay becomes head of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for the first time] (1969). *Berita Harian*, 5 April: 5.

“Pendaftaran baru Varsiti” [New university enrolment day] (1969). *Berita Harian*, 3 May: 5.

錢穆(1998)《錢賓四先生全集：素書樓餘瀟》，第53卷(臺北：聯經出版公司)。

“Seruan Naib Chancellor” [Appeal of the vice-chancellor] (1969). *Berita Harian*, 21 May: 1.

Stockwell, A.J. (2009) “The Crucible of the Malayan Nation: The University and the Making of A New Malaya, 1938-62.” *Modern Asian Studies* 43.5 (Sept.): 1149-1187.

“Ungku Aziz: Pertegoh perpaduan ra’ayat” [Ungku Aziz: To build up people’s solidarity] (1969). *Berita Harian*, 21 May: 5.

王叔岷(2007)《慕廬憶往：王叔岷回憶錄》(北京：中華書局)。

吳相湘(2007)《三生有幸》(北京：中華書局)。

謝世順(1969)〈談馬大學術人員的辭職事件〉。《南洋商報》，26 Feb.: 5。

〈由於吉隆坡發生騷亂，由星開出火車，僅僅載九名搭客星柔往隆，快車亦停開〉(1969)《南洋商報》，15 May: 3。

楊清龍(編)(2013)《馬來亞大學中文系五十週年紀念特刊》(吉隆坡：馬大中文系畢業生協會與馬大中文系)。

鄭良樹(2001)〈王叔岷教授與新、馬〉。《書目季刊》35.3 (Dec.): 1-7。

〈中南區秋傑律 華巫親善合作〉(1969)。《南洋商報》，27 May: 5。

## WORKS CITED

- Abdul Majid Ismail (1971)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Appointed by the National Operations Council to Study Campus Life of Students of the University Malaya* (Kuala Lumpur: Jabatan Penchetak Kerajaan).
- Abu Bakar A. Hamid & K.T. Joseph (eds.) (2009) *The University at Pantai Valley Glimpses of the Past*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 Andrew, Molly (2015) *Shaping History: Narratives of Politics Change*. Trans. Chen Jubo (Taipei: Linking Press Co.).
- “Bincheng daxue luqu sanshier ming likesheng dingqi liuyue erri shangke Mada jiaoshou xiezhu jiangshou” [University in Penang admits 32 science students on June 2, professors from University of Malaya will assist in teaching] (1969). *Nanyang Siang Pau*, 22 May: 6.
- Chen Hongneng (2007) “*Huaren yu Xinjiapo zhongxi yixue: Cong kaibu yibayijiu dao jianguo yijiuliuwu nian*” [*Chinese and Western and Chinese Medicine in Singapore: From Founding in 1819 to Independence in 1965*] (Singapore: Socie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 Chen Pingyuan (2019) “Ruhe jinru lishi” [How to Enter History]. Chen Pingyuan & Xia Xiaohong (eds.): *Chumo lishi: Wusi renwu yu xiandai Zhongguo* [*Touching History: Men of Letters in the May Fourth Era and Modern China*] (Hong Kong: Zhonghe Publications).
- Comber, Leon (1983) *13 May 1969: A Historical Survey of Sino-Malaya* (Kuala Lumpur: Heinemann Asia).
- “Dama yuanshou jinji xuangao jinru yanzhong jinji zhuangtai zhengfu you quan jiang weifan jieyanling zhe jiangqi quzhu chujing huo panchu sixing” [The King of Malaysia declared state of emergency and the government has the power to deport or impose death penalty on those who violate the law] (1969). *Nanyang Siang Pau*, 15 May: 1.
- “Dongguo zuo xunshi shusaoluan diqu baozheng jumin fuli jiang shou zhengfu zhaogu liangchu shourongsuo nanmin liangshi chongfen gongying xuezhou ling yiwan hu huopei yi zhuyao shiliang” [Tunku visited riotous areas yesterday and guaranteed that residents’ welfare will be taken care of. Adequate food for refugees in two shelters. Another 10,000 households in Selangor are provided with staple food] (1969). *Nanyang Siang Pau*, 19 May: 1.
- Franke, Wolfgang (2013) *Wei Zhongguo zhaomi: Yiwei hanxuejia de zizhuan (Im Banne Chinas)* [1997]. Trans. Ouyang Su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 “Harus-kah Universiti di-perbesarkan?” [Should the university expand?] (1969). *Berita Harian*, 8 April: 2.
- “Hezhongshe jizhe muji Longshi baoluan qingxing, xinghuo tuoshen” [UPI reporter witnessed riot in Kuala Lumpur, luckily escaped from death] (1969). *Nanyang Siang Pau*, 13 May: 1.
- Ho Peng Yoke (2007) *Xuesi licheng de huiyi: Kexue, renwen, Li Yuese* [*Reminiscence of a Roving Scholar: Science, Humanities and Joseph Needham*] (Taipei: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

- “Hua-Wuren oudou, shiwuren sangsheng” [15 people died in a conflict between Chinese and Malays] (1969). *Nanyang Siang Pau*, 14 May: 1.
- “Ji Jilongpo xuanbu jieyan zhihou Xue-Pi ji Bincheng yi shishi jieyan” [Curfew is imposed in Selangor, Perak and Penang following the declaration of curfew in Kuala Lumpur] (1969). *Nanyang Siang Pau*, 14 May: 1.
- “Jilongpo Badaling jieyan shijian zaiyanchang jushi xuyou gaishan bashi huifu chuanxing youzheng zongju kaifang Sen Jia liangzhou yiban qingkuang lianghao” [Kuala Lumpur, Petaling’s lifting of curfew time. Situation continues to improve as buses resume service. Post Office opens Negeri Sembilan and Melaka in generally good condition] (1969). *Nanyang Siang Pau*, 21 May: 5.
- “Jilongpo fasheng saoluan shijianzhong, liang Huaji zhiling xiongdi zouru Wujiren zhujia” [Two Chinese teenage brothers walked into a Malay’s house during a riot in Kuala Lumpur] (1969). *Nanyang Siang Pau*, 18 May: 6.
- “Jilongpo jiqi zhouwei jushi reng yanzhong jieyanling jiechu qijian xu fasheng baodong shijian sangsheng zhe da qishiwuren liangbai qishiqiren shoushang sanshijian fangwu beifenhui gezhong chezi bailiang zaoyang” [The situation around Kuala Lumpur is still serious. Riots continue to occur during the lifting of curfew order. Seventy-five people killed. Two hundred and seventy-seven injured. Thirty houses burned down. Hundreds of cars damaged] (1969). *Nanyang Siang Pau*, 16 May: 1.
- “Jilongpo shishi jieyan Gang-Longxian hangji tinghang” [Kuala Lumpur is under curfew, flights between Hong Kong and Kuala Lumpur are grounded] (1969). *Nanyang Siang Pau*, 15 May: 6.
- Khoo Kay Kim (2005) *100 Years: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 Kua Kia Soong (2007) *Yijiu liujiunian Dama zhongzu baoluan: Wuyisan jiemi wenjian (May 13: Declassified Documents on the Malaysian Riots of 1969)*. Trans. Yang Pei Keng (Kuala Lumpur: Suaram).
- Li Yingfa (2015) “Zhuangxue dashi Wang Shumin” [The Great Scholar of Zhuangzi Studies: Wang Shumin]. *Journal of Xihua University (Philosophy & Social Sciences)* 34.5 (Sept.): 53-58.
- “Liangshi jiuji tebedui zuo wang saoluan yingxiangqu fenfa maipian yu renmin” [Yesterday Special Food Relief Teams went to riotous areas to distribute cereals] (1969). *Nanyang Siang Pau*, 22 May: 5.
- Lim Chee Seng (2009) “English in the University.” *Glimpses of the Past: The University at Pantai Valley*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105-121.
- Lim Chung Tat (2013) *University of Malaya 1949 to 1985, Its Establishment, Growth and Development*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
- Lim, Shirley Geok-lin (2001) *Yuebai de lian: Yiwei Yayi Meiguoren de jiayuan huiyilu (Among the White Moon Faces: An Asian-American Memoir of Homelands)* [1997]. Trans. Joan Chiung-huei Chang (Taipei: Rye Field Publishing).
- “Longshi jieyan qijian jiedao yipian lengjing” [The streets of Kuala Lumpur are quiet during curfew time] (1969). *Nanyang Siang Pau*, 19 May: 1.
- “Luyou lu wujia Wuren jianjue yao changzhu xiaqu, Huazu youren jiyu chongfen

- baohu” [Five Malay families in Jalan Loke Yew are determined to stay, well protected by their Chinese friends] (1969). *Nanyang Siang Pau*, 8 June: 6.
- “Mada fuxiaozhang zuori baozheng waidi xinsheng weidengji bideng xue’e kebaoliu ruxue shouxu jiang jixu banli” [Yesterday the vice-chancellor of University of Malaya guaranteed students who have not registered for their places will be able to keep the places and continue the admission process] (1969). *Nanyang Siang Pau*, 25 May: 6.
- “Mada zhanqi kaike xuesheng quanbu pingan” [University of Malaya postpone new semester, all students are safe] (1969). *Nanyang Siang Pau*, 18 May: 5.
- “Mahasiswa berkempen membantu orang-orang pelarian” [University students rally to help refugees] (1969). *Berita Harian*, 22 May: 6.
- “Pendaftaran baru Varsiti” [New university enrolment day] (1969). *Berita Harian*, 3 May: 5.
- “Pertama kali Melayu jadi dekan fakalti pertanian” [Malay becomes head of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for the first time] (1969). *Berita Harian*, 5 April: 5.
- Qian Mu (1998). *Qian Binsi xiansheng quanji: Sushulou yushen*, volume 53 (*The Complete Works of Qian Mu*)(Taipei: Linking Press).
- “Seruan Naib Chancellor” [Appeal of the vice-Chancellor] (1969). *Berita Harian*, 21 May: 1.
- Stockwell, A.J. (2009) “The Crucible of the Malayan Nation: The University and the Making of A New Malaya, 1938-1962.” *Modern Asian Studies* 43.5 (Sep.): 1149-1187.
- Tay Lian Soo (2001) “Wang Shumin jiaoshou yu Xin-Ma” [Professor Wang Shumin in Malaysia and Singapore]. *Bibliography Quarterly* 35.3 (Dec.): 1-7.
- “Ungku Aziz: Pertegoh perpaduan ra’ayat” [Ungku Aziz: To strengthen people’s solidarity] (1969). *Berita Harian*, 21 May: 5.
- Wang Shumin (2007) *Mulu yiwang: Wang Shumin huiyilu* [*Memoir of Wang Shumin*] (Beijing: Zhonghua Publishing House).
- Wu Xiangxiang (2007) *Sansheng youxing* [*Three Fortunate Lives*] (Beijing: Zhonghua Publishing House).
- Xie Shi Shun (1969) “Tan Mada xueshu ren yuan de cizhi shijian” [On the resignation of academic staff of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 (1969). *Nanyang Siang Pau*, 26 Feb.: 6.
- Yang Ching Leng (ed.) (2013) *Malaiya daxue Zhongwenxi wushi zhounian jinian tekan* [*Special Issue of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the Chinese Department, University of Malaya*] (Kuala Lumpur: Pejati &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y of Malaya).
- “Youyu Jilongpo fasheng saoluan, you Xing kaichu huoche jinzai jiuming dake Xing-Rou wang Long, kuaiche yi tingkai” [Owing to the riots in Kuala Lumpur, the train from Singapore carried only nine passengers. Express from Johor-Singapore to Kuala Lumpur stopped either] (1969). *Nanyang Siang Pau*, 13 May: 5.
- “Zhongnanqu Qiujieluo Hua-Wu qinshan hezuo” [Chow Kit Road of Tiong Nam district: Cooper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Malays] (1969). *Nanyang Siang Pau*, 27 May: 5.

## 摘 要

一九六九年的五一三事件，是馬來西亞史上嚴重的一場暴亂，影響深遠。其遺留下來的負面心理影響與創傷不僅是一條纏繞無解的複雜心結，輕易成為政客五年一次操弄的有效符碼；更甚的是其導向的各種國家體制構成，至今依舊是牢不可破的頑固框架，影響了每一個後來者。可以說，此事件除了改變馬來西亞的政治面貌，亦促使所有在這片土地上個人與族羣命運的徹底轉向，造成今天馬來西亞學術格局的關鍵性歷史事件。位於斑荖谷(Lembah Pantai)的馬來亞大學，地理位置上靠近事件震央。作為國家頂端的學術機構，當時身處校園裏的學者與學生如何面對五一三？而當時的校園氛圍、學術面貌與大學體制究竟為何？本文以何丙郁、王叔珉、林玉玲、林志成(Lim Chee Seng)等馬大文學院中英文系師生的回憶書寫與文學追憶，嘗試釐清與還原五一三前後（一九六二年至一九七二年）馬來亞大學學術的內在氛圍與更變。

關鍵詞：五一三、馬來亞大學、回憶錄、校園氛圍、學術體制

### Revisiting Lembah Pantai during the May 13 Incident: The Campus Atmosphere and Drastic Institutional Changes as Remembered by Students and Teachers from the Departments of English and Chinese Studies

TEOH Hooi See  
University of Malaya

#### ABSTRACT

The May 13 Incident in 1969 was one of the most influential riots in the Malaysian history and it exerted a profound impact on Malaysian history. It left negative psychological imprints and internal undertakings that cause complicated and unsettled misunderstanding on the people of the country. Politicians had turned the incident into a tool to bargain for political manipulation. Moreover, it induced the emergence of various incident-directed national structures and it is still one of the most obstinate compositions until now. We could say that this event changes the political landscape of Malaysia, facilitates the thorough transformation of the destiny of the people and ethnic groups on this land, with the addition of being the historical event that forms the current academic structure in Malaysia. University of Malaya, situated at Lembah Pantai, Kuala Lumpur, was geographically proximate to the epicentre of the event. The university



functioned as the highest academic institution of the country. How did the academicians and students in the university face the event? What and how were the atmosphere at the university, academic outlook and university system at that time? By utilizing the memoir writings and literary recollections of the students and teachers from the Departments of English and Chinese Studies in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 such as Ho Peng Yoke, Wang Shumin, Shirley Geok-lin Lim and Lim Chee Seng,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clarify the internal academic atmospheres and changes of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 between 1962 and 1972 (before and after the event of May, 13).

Keywords: May 13 Incident, The University of Malaya, memoir writings, university atmosphere, academic system

---

\* 張惠思，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現為馬來亞大學中文系高級講師，研究領域為清中葉至近代文學、近現代馬華文學。著有散文集《心事紅紅》、詩集《站在遺忘的對岸》和專欄寫作文章如《窗雨下的謬思》、《晴雨札記》等。